

作为历史记忆的北京

——“五方杂处”说北京之四

陈平原

感慨“北京学”之不受重视，说的不是新闻界，也不是文学界，而是史学家。“旅游热”里的北京，比如胡同游、风味小吃，比如保护四合院、重建城墙，还有老舍茶馆的曲艺、正乙祠的京剧，以及电视台之推介名胜古迹、出版界的展示“旧京大观”等。诸如此类的活动，当然也有专家介入，但学院派似乎不肯再往前走一步，将其转化为学术课题。

前几年江苏美术出版社顺应怀古思潮，推出《老城市》系列，其中《老北京》一册被指责为硬伤多多（参见危兆盖《〈老北京〉硬伤举例》，载《中华读书报》1999年4月14日）。出版社很聪明，马上发表公开信，感谢批评，并称正抓紧修订，将与第二、第三部合成三部曲一并推出，相信“会让读者更加满意的”。也就是说，以下的更精彩，更值得选购——由检讨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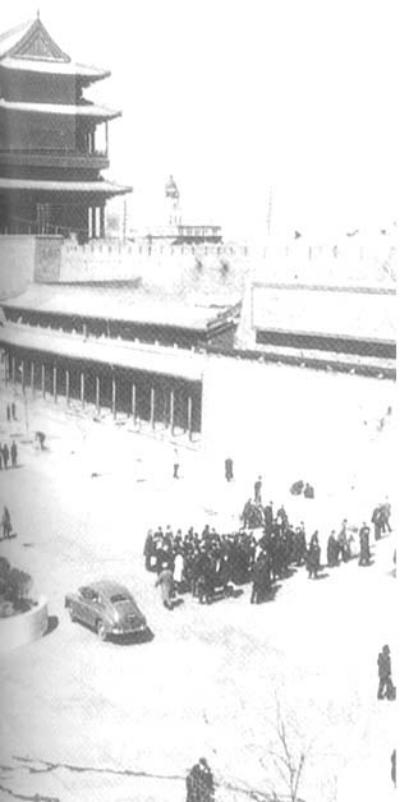
转而成了广告，实在妙不可言。其实，问题出在作品的定位上：“这套书的文字和说明应该是鲜活的、生动有趣的，通俗易懂的而又散文化的。”（参阅江苏美术出版社致危兆盖的公开信，载《中华读书报》1999年4月28日）这似乎是通例，出版社都更愿意将诠释都市的责任交给文学家，而不是史学家。倘若用的是文学笔法，又不肯下史学的功夫，其谈论历史悠久的“老城市”，很容易华而不实。

前两年，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，我提到北京作为城市研究的巨大潜力。西安作为古都，上海作为新城，都有其独特的魅力，可北京横跨古今，更值得深入研究。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，美国加州大学等学术机构通力合作，使得“上海”成为欧美汉学界的热门话题。上海开埠百余年，其“西学东渐”的足迹十分明显，历史线索清晰，

1958年拍摄的北京正阳门



万方数据



理论框架也比较容易建立。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，上海其实是个特例。相对来说，作为古老中国的帝都，加上又是内陆城市，北京的转型更为痛苦，其发展的路径也更加曲折，很难套用现成的理论。读读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述，你会感到很受启发，可用来研究北京，又总有些不太适用——在我看来，这正是北京研究的潜力所在。“北京学”必须自己摸索，因而更有理论创新的余地——这里所说的，乃理想的境界。

我所关注的“北京学”，不是古已有之的南北学术歧异，或者二十世纪蔚为大观的京派海派之争；也不是柯文（Paul A. Cohen）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9）所描述的美国学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崛起的“中国中心取向”的第二个特点：“以区域、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”展开考察与论述（142—152页）。关

于京派小说的艺术成就，或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，目前在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。我更关心的是作为“都市想象”的北京。

都市研究可以注重历史地理，比如侯仁之先生的众多研究成果（参见侯仁之主编《北京历史地图集》，北京出版社，1988；《侯仁之文集》第二部分“城市历史地理研究”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），也可以侧重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，社会与人口变迁等。侯先生大名鼎鼎，不用我多说，这里想推荐的是两部相对年轻学者的著述，一是史明正的《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——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5），讨论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北京的街道铺设、排污管道、供水照明交通等市政建设方面的问题；一是韩光辉的《北京历史人口地理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6），讨论从辽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京的户籍制度、人口规模、人口增长过程与人口控制等。此类专业著述目前数量不多，据说北京出版社有志于此，准备以“北京学书系”的形式，陆续推出文史方面的撰述，走出纯粹的文献整理与怀古感慨。

北京是个有历史、有个性、有魅力的古老城市，正迅速地恢复青春与活力，总有一天会成为像伦敦、巴黎、纽约、东京那样的国际性大都市。观察其转型与崛起，是个很有趣味的课题。施坚雅（G. William Skinner）在《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0）里说，中世纪的长安、开封、杭州，都曾是世界最大城市，南京和北京也都有此光荣。“南京在明太祖改建后的十年左右，赶上开罗成为世界最大城市，至十五世纪某一时期为北京所接替。除了十七世纪短时间内亚格拉、君士坦丁堡和德里曾向它的居首地位挑战外，北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城市，直到1800年前后才被伦敦超过。”（32页）。城市不是越大越好，私

心希望北京成为像伦敦、巴黎那样适合于人类居住而又能吸引大量游客的“历史文化名城”——首先是对于本地民众的精神与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，而后才是对于投资者与观光客的吸引力。施坚雅此书中译本的出版，整整迟到了二十年。可这也有好处，那就是我们有了观察的距离与评判的能力，对其热衷于使用计量方法，突出城市研究的社会性与经济性，而相对忽略城市的人文性，会有所反省。

近年翻译出版的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作，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，比如我手头有的意大利学者L.贝纳沃罗（Leonardo Benevolo）的《世界城市史》（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2000），以及美国学者凯文·林奇（Kevin Lynch）的《城市意象》和《城市形态》（华夏出版社，2001）。建筑作为凝固的历史，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。解读古老的教堂（宗教）、宫殿（政治）、城堡（军事）、市场（经济）、学校（文化），以及连接外部世界的港口与桥梁，确实能让我们贴近历史；可倘若没有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这样物是人非的凄婉故事，单是一堆石头，无法激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与想象力。也许是出于私心，我希望将建筑的空间想象、地理的历史溯源，与文学创作或故事传说结合起来，借以呈现更具灵性、更为错综复杂的城市景观。若陈学霖的《刘伯温与哪吒城——北京建城的传说》（台北：东大图书公司，1996）之以史家学养处理一则表面看来荒诞无稽的传说，将民俗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和宗教学等眼光重叠起来，虽然结论“传说所见大小传统的交融”并没多大震撼力，但其选材之巧妙，以及步步为营的论证，还是很令人愉悦。❶

（责任编辑 晚晴）

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